

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

蔡翔

卷

面对文学的困境、局限与悖论，
他们始终坚持于严肃的激情，
以无限接近那些可以想象的真实。

蔡翔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

蔡翔◆著

蔡翔

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书系·蔡翔卷/蔡翔著.—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303-10845-9

I. ①当… II. ①蔡… III. ①当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7558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7
字 数:414千字
版 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2.00元

策划编辑:马佩林 责任编辑:马佩林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自序：流水三十年

1982年，我写了第一篇文学评论文章《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那时，我还在上海一家工厂的技工学校工作，课余无事，常常乱翻杂志，恰巧读到路遥的《人生》，心有所动，便著此文。文章写好后，投稿给《上海文学》，不久，收到通知，约我去编辑部面谈。在上海巨鹿路675号那座老洋房三楼一个朝北的小房间，我见到了周介人老师，后来又见到了李子云老师，他们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也成了我的引路人。文章后来发表在《上海文学》1983年的第1期。再不久，我就调到了《上海文学》杂志社，直到2003年，我才最终离开，到上海大学工作。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想想，也真有点“弹指一挥间”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即使90年代，也未免恍如隔世。恍惚间，栩栩如生的，反而是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本没有什么“两个三十年”，有的只是“六十年”，共和国六十年。后来发生的一切，可能都已隐藏在一种共和国的记忆之中。而这一记忆，被反复唤醒，并被形式化。

我想，对许多人来说，20世纪80年代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代，我也一样。但我以为，80年代不应该只是80年代人的纪念馆，它还应该成为一座活着的图书馆，以供人们反复阅读，并被不断地征用。重新讨论80年代，是我目前的一项主要工作，但困难很多。困难之一，恰恰在于自己的亲历性，经验有时候反而可能是一种羁绊，甚至视野和想象的局限。因此，个人的记忆也仅仅只是个人的记忆而已。

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基本上以文学评论为主，后来出版过两本著作，一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另一本是《躁动与

喧哗》。我不太清楚别人的知识背景，但我个人而言，我受别林斯基的影响很深，无论是他的文章风格，还是他对俄罗斯的深厚的感情和关怀，直到今天，这种影响还在。后来有些人批评别林斯基，坦率说，我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

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尤其在文学批评领域，好像是一个没有规范和家法的年代，每个人都在突出自己的个性，指点江山，挥斥方遒，隐约其中的，或许正是吉登斯所谓的“解放政治”。当然，就我个人而言，也难免逞才使气，语不惊人死不休，以辞害意也是常有的。

但另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走进20世纪80年代，并且努力塑造着80年代。一个人和一个人不一样，一代人和一代人也不一样。对我而言，被唤醒的，可能是60年代的记忆，这一记忆被压抑在70年代。那或许是一种有关青春和激情的记忆，一种解放和抗争的记忆，也可能是一种重新创造世界的记忆——有关这一切的记忆，都隐蔽在共和国的理念之中，或者，我也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革命”的理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也是对这一理念的遥远的回应，尤其是有关“异化”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暗暗接通了60年代的血脉。因此，80年代，在它拒绝政治的同时，却隐伏着另一种重新创造政治的愿望。这可能更重要。但是，80年代毕竟有着它的规定性，尽管80年代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可在60年代或者70年代找到它的历史缘起，但仍然不能完全说明80年代的重要意义。80年代的重要性仍然在于它处在“两个三十年”之间，它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历史意义，至今仍然难以估量。然而，这一转折的最终完成，却是因为各种因素，甚至包括偶然的历史机遇。而在这一历史机遇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学的介入。一些历史事件被重新解释，比如“五四”“个人”再次成为一个统治性的概念。所谓“现代化”，也更多地被技术化，或者可以称之为“技术现代性”。正是“技术”（科学）的介入，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才可能完成。显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制度崇拜—意识形态崇拜，也正是80年代的逻辑演变，这一逻辑帮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尽管不可能每个人都被这一逻辑吸纳，但仍然可以看出一种大致的变化。因此，一方面，80年代在努力回应“革命”的理念，另一方面，又中断了这一“革命”的逻辑发展，人们试图找到另一个逻辑起点，“社会主义”被简单地解释为“封建”和“人治”，而“80年代”则被理解为“现代”和“法治”。在所谓重新“创造政治”

这一逻辑的裹挟之中，除了继续的“西方化”，似乎也很难找到自己新的形式化的可能。我想说明的是，尽管如此，80年代的文学仍然呈现出一种抗争性的态势，它似乎并未心甘情愿地被这一“现代性”所“启蒙”，但是却逐渐退回到审美的领域，个人始终被强调，并抗拒一切的规范、约束和异化的可能，但并不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美的领域。正是在这一领域中，同时生产出了一种巨大的幻觉，当然，幻觉依然可以生产激情，甚至理想主义的激情。

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许多事情，因此，这一时代就不可能被完全地作一种扁平化的处理。对我来说，1984年也许非常重要。“个人”的迷狂并未持续太久，“文化”这个概念开始引起我的兴趣。尽管，在当时，这个概念仅仅停留在人类学的层面，但也足以引发我们继续的思考。一方面，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机械的二分法，已经无法继续吸引我们，“文化”恰在此时打开了另一个广阔的领域；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文化”这个概念可能悄悄地重新接通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个人不再处于世界的中心，历史、国家、族群甚至社会现实，都在这一关系领域中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一种记忆，一种有关60年代的记忆也再次被悄悄唤醒，只是那时候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中，有一篇文章《知识分子和文学》中说道，当“知识分子在现实中，已经逐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且开始分享权力和财富。当知识可以同权力和财富进行等价或半等价的交换时，它还能保持自己‘现状反对者’或‘社会良心’形象吗”？20多年后，不幸而言中。当时有意识的，可能是“文化批评”这个概念。《躁动与喧哗》一书中，收录了我和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林爱莲女士的一次对话，在对话中，我强调了“批评如果能够进入了‘文化层面’，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而在方法论层面，则更强调“为什么这样写”。当然，总体上仍然局限在一种“个人化”的立场，“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再具体地说，是它的个人化立场，它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地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反映”。这就是80年代对我的启发和制约，它和后来的“文化研究”并不完全一样。重新翻阅旧著，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名为《神圣启示录》，里面粗糙地讨论了“文革”，也完全受制于当时的思想氛围，但却强调了“重建信仰”。

20世纪80年代终结于1989年，但在1989年之前，却已经出现了某种疲惫的情绪。创造的激情开始冷却，怀疑和自我怀疑再次开始。我

之所以要提出“之前”，因为我反对把一个时代的终结直接归之于某一政治事件，那样只可能束缚我们的思考。但是，1989年却把这种情绪强化了。反过来，也促使我们更深刻地思想，包括更广泛地阅读。

1989年之后，我的写作范围开始扩大，但基本上仍然延续着所谓的“文化”。我讨论过武侠小说，后来结集为《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有几年，沉迷于古代，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所谓的学术小品《自由注解》，另一本是《此情谁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当然，这些文章搁到今天，我未必敢写，也正应了俗话，读书越多，胆子越小。但在那个时候，多少有一种重新反思20世纪80年代的愿望在内。而在1994年，我出版了《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那是一本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80年代的浮华之气略有减退；相反，可能更多的，是疑虑重重以及再次奋发的希冀。

90年代，我很少写作当代文学最新作品的评论，一方面，我觉得不断地追踪新的作品越来越困难，而另一方面，我一直隐隐地抗拒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一直把自己定义为“自由写作者”，所以在90年代的后期，我基本上从事两方面的写作：散文和随笔。后来，散文结集为《神圣回忆》，随笔则命名为《回答今天》。

对我个人而言，20世纪90年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80年代，尽管至今我仍然难以描述这个年代。但在那个年代，一种批判意识开始重新确立，并强调“批判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我的确不太清楚应该如何描述这个时代，但有一点，在比喻的意义上，我会将这个时代解释为一个“小时代”，一个不断向内又不断缩小的时代，一个模仿和复制的时代。

我应该提到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一书，这本书虽然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于香港，但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大陆。书中的一些作者都是我在80年代的朋友，我一方面感叹于他们在学术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他们对现代性的重新讨论，将“社会主义”从一度流行的“封建”的解释中解放出来，从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讨论空间。当然，我也有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过于“现代”，而忽略了“革命”的特殊意义。可能，这就是后来我为什么会写《叙述/革命之后》一书的原因之一。但是，《再解读》仍然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使我看到了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化的重要可能。

20世纪90年代对我来说，重要的，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更重要

的可能是现实的急剧变化，这一变化才真正使我们从 80 年代的幻觉中走出，直面现实。隐秘已久的 60 年代的记忆，这个时候才可能被真正唤醒。1996 年，我写作了《底层》一文，很多年后，也就是 2006 年，我在《何谓文学本身》一书的自序中，回顾了这篇文章的写作前后：

大概在十年前，我写过一篇名为《底层》的散文，在那篇文章里，我记录了当时的感想和感受。今天，“底层”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泛化的语词，而且，开始进入学术讨论的视域。我无意把我当年的那篇文章纳入这一知识谱系，事实上，今天相关的学术讨论与我这篇文章没有丝毫的关系，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写作活动。在这里，我重提旧事，只是感慨于现实的残酷性程度，正是现实的残酷，才逼使这个词浮出水面。在学术研究的热闹背后，却是一个阶级的日益贫困和更加不堪的生活状况。每念及此，常常感慨万千。

……可是，我仍然得面对这个语词，不仅因为这个语词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现实，而且，我们还得面对因为这个词而导致的各种批评意见。而最令人不解的是，这些批评意见居然主要来自于文学批评界。或许，因为这个词的粗暴进入，破坏了文学的所谓的美和诗意，破坏了文学久已习惯的想象方式？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似乎是，似乎也不完全是。

我们真正需要面对的，可能还是这样一种意见，今天重提“底层”的目的何在？的确，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也不完全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一个理想的社会形态，是不能也不应该漠视底层以及所有弱势阶层的存在。我们必须确立一种这样的社会原则，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普遍的价值诉求，甚至成为“政治正确”的核心内涵。

也许，《底层》这篇文章，暗示了我的一个新的写作时代的开始，只是，当时并没有意识到。2009 年的夏天，我应李云雷兄之邀，到清

华大学参加他主持的一个有关“底层文学”的讨论会，在会上我有一个简短的发言。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底层文学”这个概念，而且，坦率说，我对这个概念有点疑惑。也是在那篇自序中，我提到：“然而，在文学的意义上，我的态度却会更加谨慎。因为‘政治正确’并不可能保证一部优秀作品的诞生，这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常识。如果把‘底层’仅仅视为一种题材，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重新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旧式陷阱。即使把‘底层’当做题材，那么它也永远无法替代文学的其他叙事元素。‘写什么’和‘怎么写’不应该成为一个次序先后排列的问题，它们永远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共同完成文学的叙事过程。在我而言，重要的并不在于是否具体地叙述底层，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词成为一个‘在场’的‘他者’，是在这个词的目光注视中，开始我们的叙事。”可是，我仍然支持这一写作倾向，我的意思是，这一文学写作倾向最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有益的启示：一、重新引入政治经济学的叙述视野，并挑战心理主义的霸权地位；二、重新讨论个人和所属族群的关系，并挑战个人中心主义；三、重新讨论私人情感和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挑战泛滥化的审美主义倾向。当然，更重要的是，并不是就此轻易地否定心理主义，等等，而是如何在这数者之间构置一种必要的张力。当然，在我看来，所谓“底层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如何创造一种重新解释世界的思想，否则的话，即使“批判现实主义”，也可能无奈地默认资本逻辑的合法性。如此这样的话，那么，“底层文学”的意义就值得怀疑。

我在《何谓文学本身》的自序中，曾回顾了近十年来的思想过程：“对我来说，近十年来的道路，是一段相当漫长的旅程，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转型的痛苦，内心更充满了困惑、焦虑甚至分裂，许多的想法沉入心底，成为隐秘，难以言说。正是在内心的隐秘深处，一些确立已久的信念开始动摇，而另一些曾被压抑许久的记忆却又渐渐复活。在许多的时间里，我默默注视自己，一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我曾经一度想放弃写作，我不知道该怎样叙述这个暧昧的、分裂的、身份可疑的自我——直到今天，这种想法仍然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我的写作的意义何在，甚至有无意义，而在二十年前，这却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写作前提。”不过，我仍然没有放弃寻找。

重要的，可能是“文化研究”这个概念的出现。同20年前的泛化的“文化”概念相比，“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性，而且指向

明确：“另一些语词却在这个时代愤怒地涌现出来：资本、权力、阶级、市场……，等等。我们与这些语词遭遇，与这些语词背后的残酷的现实遭遇，现实逼使我们重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或部分地接受所谓的‘文化研究’，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知识的需要，更多的，仍是现实使然。是我在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确立过程之中，渴望找到的某种理论资源或者写作范式。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或者对我的朋友来说，‘文化研究’更多的可能只是一个‘能指’，我们依据这个‘能指’来重新组织我们的叙述，包括对文学的叙述。”就我个人而言，这一所谓的“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完全在于它的西方理论的背景，而是它有可能接通我的历史记忆，这一记忆包括国家、阶级、公正、平等，等等。实际上，有关“纯文学”的讨论，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当然，我并不排斥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相反，我愈加认识到理论的重要性。而在理论转型的同时也正是知识和学术的转型。

2002年，我调到上海大学工作，学院给我一个新的专业化的工作环境。授课、读书、讨论、写作……几乎构成了我全部的生活内容。在这一环境中，我开始把我的经验和感觉知识化，也开始从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研究。

有几年时间，我的工作内容完全围绕重新讨论“十七年”的文学和文化想象。方法论上仍然延续了我在20年前所希望的“为什么会这样写”的讨论理路，而在具体讨论中，则基本上让文学史和社会史处于一种互文性的叙述之中。就像我为这本书撰写的内容简要中所说：“这些讨论既在文学之中，又在文学之外，这和作者近年来一直强调的打通文本内部/外部的研究有关，也可以视之为当代文学研究方法论上的新的实践。显然，作者努力使文学重回公共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文学史始终处在和社会政治史积极对话的过程中。作者在强调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回避无理性的一面，而是严肃讨论这一正当性如何或因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事实上，我也从不认为只有一种最好的研究方法，但在这本书中，我更愿意采取这种方法。

实际上，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展开，我愈加意识到政治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对既定的世界秩序的安排，而且愿意继续讨论“世界应该怎样”，那么，这就是政治的。所以，在文学性的背后，总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性本身就构成了文学性。

当然，对我来说，“文化研究”只是一种理论或者方法论上的过渡——“如果哪一天，‘文化研究’控制或者开始限制我的思考，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它”。今天，我仍然是这一看法。

我在最近完成的著作《叙述/革命之后》的导论中谈到，罗兰·巴丢在《共产主义的设想》中以一种决断性的修辞方式阐释了西方左翼在今天的命运和工作：“从许多方面看，我们今天更贴近于19世纪的问题而不是20世纪的革命历史。众多而丰富的19世纪现象正在重新搬演：大范围贫困，不平等加剧，政治蜕变为‘财富仪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虚无主义，众多知识分子的奴性屈从，探索表达共产主义设想的众多小团体的实验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围追堵截的实验精神……无疑就是这种情况，和19世纪一样，今天最关键的不是共产主义假设的胜利，而是它的存在条件。处于目前压倒性的反动间隔期之中，我们的任务如下：将思想进程——就其特质而言总是全球化的，或普遍的——和政治经验——总是地方性的和独一无二的，但毕竟是可传播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共产主义设想得以复生，既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也在这片大地之上。”在某种大致的也是粗略的意义上，我可能倾向于巴丢的说法，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回到19世纪？没有别的路径，我们只能带着20世纪的思想遗产——这一遗产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包括20世纪的失败教训——回到19世纪，重新地思考、探索和准备另一个世纪的到来——也许，这个世纪遥遥无期。但是，也正如鲍曼在《寻找政治》中所言：“知识本身并不能决定我们对它做何种使用。归根到底，这事关我们自己的选择。然而，没有这种知识，任何选择就无从展开。有这种知识，自由人至少有行使其自由之机会。”

在这一意义上，我开始注意并重视学院的知识生产的工作。

我现在的主要工作是重新讨论20世纪80年代，也许，我对80年代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之后，才可能较为完整地描述这“六十年”的历史演变的过程。我不会轻易地否定80年代，实际上这一时代的复杂性并没有在我们的叙述中被完整地再现出来。我也不会轻易地否定这个时代涌现出来的概念：民主、自由、个人、法治，等等。相反，我一直努力把把这些概念纳入到我的思想谱系之中，并和其他的概念一起构成对世界的设想。

我亲历并见证了这“三十年”的变化，我也一直在寻找通向未来世界的道路，这一寻找隐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记忆之中，至今，我也并未放弃这一寻找，尽管寻找在今天变得怎样的困难重重。我看着自己的生命渐渐老去，但在内心深处，仍然回荡着少年时代的呐喊——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我们始终是共和国的长子。

目 录

自序：流水三十年 / 1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的阅读笔记 / 1

文学、经验和形而上学 / 49

知识分子与文学 / 61

小说与日常世界 / 71

旧时王谢堂前燕——关于王朔及王朔现象 / 82

我们走向哪里 / 99

私人性及其相关的社会想象——一种历史沿革的关系描述 / 106

当代小说中土匪形象的修辞变化 / 126

九十年代小说和它的想象方式 / 138

何谓文学本身 / 154

作为一个话题的“文化研究” / 172

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
的阅读笔记 / 176

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思考角度 / 196

离开·故乡·或者无家可归 / 220

城市书写以及书写的“禁言之物”——关于《城市地图》
的文本分析和社会批评 / 236

酒店、高度美学或者现代性 / 255

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 / 278

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化政治和政治的文化冲突 / 332

附录 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文学这三十年”

三人谈（蔡翔、罗岗、倪文尖） / 371

后 记 / 417

20 世纪 80 年代小说的阅读笔记

一、高加林和刘巧珍

——《人生》人物谈

莱伯尼兹有句名言：“现在怀着未来的身孕，压着过去的负担。”我们在路遥新作《人生》的两个主人公——高加林与刘巧珍——的性格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的折光反映。

高 加 林

高加林的命运悲剧已经远远离开了二度的平面，诚如作者所言：它包含了“诸方面的复杂因素”。

它引起了我们如此巨大的震动，一种复杂的几乎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情绪的共鸣。是同情，谴责，痛惜，愤懑……还是些许的沉思和启示？这里，事物构不成任何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关系。

高加林算什么呢？一个普通的但却才华横溢的乡村知识青年。他向往一种新的生活，对于现代文明有着热烈的追求。对于这种愿望，又有什么可多指责的呢？然而他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一个能呼吸到城市文明的空气却又保留着古老、落后的习俗的城镇郊区，一个交织着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他的理想与现实、性格与环境交织得如此错综复杂，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不可思议的生活画面：一个明明有才能，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知识分子，却被别的有权势的人通过“合法手续”而从教师队伍中除名；随后他又依靠自己的“关系”，从“后门”进入县委大院，而“纪律检查委员会”又以合法的途径将他重新除退。

一事物就是一个局限。法是客观的、公正的，然而某些落后事物又恰恰可以利用法的这种客观性、公正性来暂时达到它们那种不很光彩

的目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当高加林成为正剧的时候，环境却成为悲剧；而当环境力量成为正剧的时候，高加林又成为一个悲剧。

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可理解却又如此值得人深思的矛盾。

生活在这样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环境中，高加林所有的只是些什么呢？他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有的只是一连串失败的记录。在他完全控制不了的环境力量中他也完全控制不了自己。他似乎不断受到命运的捉弄，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他命运的中途转机，与其说是个人的拼命努力，不如说是来自偶然的机遇——叔父的出现和马占胜的奉承。

是的，他的悲剧不能仅仅归之于他个人；

然而，他的悲剧也不能仅仅归之于社会。

黑格尔说：“人是靠头脑，也就是靠思想站着的，并按照思想创造现实世界。”就某种意义上说，人生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取决于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暂时偏离对环境的悲剧色彩的议论，来分析一下高加林的悲剧性格，寻究潜藏在他复杂的立体化的性格中的某种主导情志。

在我们的社会终于摆脱了禁锢文明的枷锁之后，生活为青年实现自己的理想提供了自由创造的广阔天地。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高加林心里燃起了对“未来生活的幻想之火”。他的聪明才智和多方面的能力使他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种自信激起了他在生活中的进取心，萌发了他性格中的某种英雄主义因素。

他是幸运的，学校丰富了他的精神生活，城市为他打开了另一个更为绚丽多彩的世界的窗口，他曾经在这里尽情呼吸过现代文明的空气；他又是不那么幸运的，他毕竟是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农民的儿子，理想同现实之间有着太大的距离，他的个人愿望同生活环境随着社会上某种消极力量的作祟而变得愈来愈彼此排斥。

于是，“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

你很难说这种愿望是完全不合理的，它的确潜藏着对于因循守旧的古老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力。但你也很难肯定它是完全合理的，它毕竟不应该蔑视孕育生命的土地。

这真是一颗奇怪的果实，然而它却结在我们如此现实的生活之树上。

当个人的欲望越过了现实的障碍，高加林的自信心便空前高涨，洋洋自得近于忘乎所以；而当现实钳制了他的欲望，他又一下子变得灰溜溜的，几乎抬不起头来。他的拼命劳动只是希望用极度的疲劳来消泯骚动的欲望。他有的只是欲望本身，没有的恰恰是把欲望化为现实的真正动力。他只能在顺境中驰骋自己的想象，而不能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貌似强者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一个软弱的、不稳定的自我。

于是我们在他自信的背后，发现了一种隐藏得更深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来自于他对“土地”感情上的疏远。“农村对他来说，变得淡漠了，有时候成了生活的一道布景。”作品中的土地象征着生他养他的亲人，象征着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疏远了对土地的感情，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免疫力，失去了生命的根，“是个豆芽菜”，从而也就谈不上确立一种正确的、坚定的生活原则。

因此，他在乡村人面前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而在城里人面前却又时时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抑。在他的性格中，自信和自卑彼此排斥却又紧密地胶合在一起。这正是他性格中潜伏着的悲剧性的危机。

假如我们社会的肌体是健全的，假如社会主义阳光照耀在每一个角落，那么，作为正剧的环境力量就有可能不断完善他的性格，而高加林本人也或许能够避免他的悲剧命运。

悲剧恰恰在于某种落后的消极的东西，至今还在我们这片存在着差别的生活土壤上滋蔓、生长。于是，合理的并不是处处、时时都能存在，存在的也不是处处、时时都是合理的。高加林的自尊在“挑粪”一节中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屈辱从反面教育了他，催化了他愿望中的出人头地的个人主义因素，并且煽动起一种盲目的报复情绪。

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于那些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完全确立的青年。由于社会尚不是由他们来开拓，他们的视野就显得过于狭窄。他们往往容易为生活的表象所迷惑。而当他们处在人生的三岔路口上时，这一影响就更不能低估。

自尊、自卑、自信错综复杂地交织在高加林的性格中，好像“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四边形”，相互冲突，相互牵制，而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它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应该说，这个结果同高加林最初的愿望是并不一致的。